

舊曲譜新調

以世界框架寫中國近代史（上）

●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

十九世紀末，由於日本的佔領台灣，造成兩岸的百年分裂。而日本之佔領台灣，又在於防禦歐美勢力入侵東亞對日本安全所造成威脅。

因此，在深刻體察這段歷史發展過程之後，當可以了解：目前的兩岸關係，如果是問題的話，並不只是中國內部的問題，而是國際問題。

如果不願中國人再為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做無謂的犧牲，則須在這些歷史發展的基礎之上審慎處理兩岸關係。

這樣一個一八九五年的國際因素引發的兩岸分裂，國人卻一直視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內部問題，再度呈顯國人以中國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的偏頗。依此類推，整個中國人的近代史都得在世界框架底下重新建構。

歷史記憶影響進程
（上）調新譜曲舊

作為一個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當我面對如何開創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內心很直接的吶喊便是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中國人是指文化上的中國人。

世界框架是相對中國框架而說的，中國框架是指以中國這塊土地為思考中國人歷史的空間範圍；世界框架是指以世界為思考中國人歷史的空間範架。

「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所要說的，包括：①以世界框架描寫中國人已經過去的近代史，以及②以世界框架寫下中國人未來的近代史。在做這樣的陳述時，有以下三個根本命題：①怎麼重建歷史會影響怎樣開創歷史；②由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一百多年間，中國人越來越以中國框架重建歷史，留下不少遺憾；③要使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有更光明的前景，一定要改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

這種訴求不直接等於擺脫民族主義史觀。民族主義，也就是關心自己民族的發展的一種想法，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感情。就像我們今天來談如何開創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這樣一個問題時，其本身就有民族主義的意涵。

此外，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是在很長的時間裡，透過歌曲、電影、小說、家訓、博物館展示、歷史教科書等，深深地烙印在每個族人的心裏，很難以拔除。例如，主張台灣獨的人喜歡說台灣人四百年史，而不說台灣人幾千年史或幾萬年史，在說台灣人四百年史時，這個「台灣人」已有中國的成分在，因為這個陳述忘了來自東南亞的台灣人，而只指四百年前開始大量由中國大陸來的台灣人。只是，就這樣一種例子也可看出以中國框架的記憶不夠完整，我們須以世界為框架來重構浸沐在中國文化裡的中國人的歷史。

尤其那些排外、仇外、不顧慮世界發展局勢的偏狹民族主義，更是該去除的。

這篇文章在做這樣的訴求時，我想先指出偏狹的歷史記憶會造成中國人的遺憾。由於探索兩岸關係史，是較以政治經濟學、經濟人類學、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切入經貿問題來談，我用來說明的與兩岸較有關的事例，也會偏重這方面的歷史往事。之所以由經貿問題切入，是因為在台灣人民的生活當中，經貿一直是很重要的一環，也較有長時間序列的資料可看出其變遷的大勢。接著，我將討論中國人以中國為框架建構歷史的一個根源，其中也會談到兩岸目前近代史觀之不足之處。其次，我將舉例說明以世界框架較之以中國框架更能看出兩岸關係史的基本輪廓之所在。最後，我將以兩岸關係史以及中國近代偏狹的民族主義史觀深遠的國際淵源，說明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的必要性。

偏狹記憶造成遺憾

事例1：李登輝總統曾為日本人之說

近年來的台海危機，使我們對兩岸關係的緊張餘悸猶存；與這「武嚇」並行的「文攻」之中，李總統向司馬遼太郎說他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這番對話，也是一個被批鬥的對象。這件事在大陸展開文攻之前，先是在台灣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期間的媒體上喧騰過。許多人還以為李登輝真有這麼說。在

台灣的媒體如此喧騰時，我只是想馬關條約是規定李登輝在二十二歲以前，或是所有在日本籍，所以以為他或許真是這麼說了。是很偶然的機會，我發現李登輝根本沒有這麼說。

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有關此事的原文是：

司馬：李登輝先生是二十二歲時從日本

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針對此段司馬遼太郎的陳述，李登輝先生沒有任何表示。這與後來台灣或大陸媒體所說李登輝先生自己向司馬說李曾是日本人有著很大的扭曲。在這裡，要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扭曲？一個很直接的原因是：國人對日本人留下太多負面的歷史記憶了。但即使就中國法制的現代化而言，日本對中國的貢獻就很多，造成這種因偏狹的歷史記憶而引起的誤會，實屬遺憾。

事例二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著作，大都認為人口過多是中國發展的一大包袱。但一看日據時期的台灣，當時的中國大陸人口成長幾乎停滯時，台灣人口卻因為綠色革命及醫療衛生的改進而由二五五萬增為六〇〇萬，雖然人口顯著成長，每年仍須由中國大陸移入一萬以上的勞工，協助採礦、採茶、鞋匠、裁縫師等工作。當綠色革命及醫療衛生雙管齊下時，台灣的平均壽命提高，宿命觀逐漸擺脫，婦女會、青年會等紛紛成立，民族運動、民間廟會轉趨活潑，白話文、芭蕾舞、現代流行歌曲、現代話劇、現代美術等藝文活動也相繼展開。相對地，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在採行封閉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土地不夠扶養人口之說更衍為社會理念，一胎化政策在嚴苛之外，是否造成小皇帝們（The spoiled one-child）驕寵霸道的集體性格已引起學界的注意。

另一個事例則由尹仲容說起，尹仲容是任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經濟部長、中央信託局局長與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等職務。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時，卻因中央信託局貸給揚子木材公司的貸款無法如期償還而移送法院偵辦。在一年多的法院調查期間，尹仲容辭去所有職務，在家侍母、讀書之餘，即從事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二）年譜的編纂。郭嵩燾在幫助太平天國之亂之後，曾出使英法兩國，回來積極提倡世界知識，但為朝廷所不容，被社會人士指責為漢奸，在被解職期間，其家鄉住宅還被搗毀。

郭嵩燾所提倡的世界知識包括公營企業開放民營，與尹仲容在美援的護持下鼓勵民營企業之主張相似。揚子木材公司案因國營派之揭發而被調查，是這個政策下的一個不幸。尹仲容仲容在此案被調查期間編寫《郭

嵩燾年譜》，宛如歷史的重演：一個較受西方影響的開放經濟理念不見容於中國。但郭不復受用，尹仲容在法院宣判無罪之後，又歷任經安會秘書長、外匯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推動台灣由保護主義轉為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也帶動了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一直要到鄧小平採行開放經濟才看到類似的政策採行。即使鄧小平的政策仍有頗多統制，但距離郭嵩燾的時代已近百年。這些歷史往事不禁讓我們興問：如果在郭嵩燾的年代，中國人即能擺脫偏狹的民族主義，那中國人是否會比今天更幸福許多？

以世界框架究源頭

最近日本學者經常指出，當近代日本在十九世紀要擺脫十八世紀的鎖國階段，而在東亞方面拓展商業時，遭到在東亞海域有根深蒂固商業網絡的中國商人強力阻隔，這使得日本的空間座標跟著調整，三井、三菱等商社，因此紛紛發展成爲國際公司。但中國卻相當自足於原來的基礎之上，不再往外擴展。

因爲中國在東亞海域商業網的根深蒂固，也使鴉片戰爭前夕的中國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而鎖國的日本則否。與世界經濟的緊密相連，從而引發的商貿衝突，也是近代中國外患不斷的重要因素，這使救亡圖存成爲

近代中國的最大課題，中國的民族主義重點也因此在於保住中國。也就是說，很弔詭地，中國由十八世紀以來與世界經濟的緊密關係，反而使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人更陷入以中國爲範圍的歷史思考框架之內；反之，日本在十八世紀的鎖國反而使其在沒有外患逼迫的近代，發展往世界擴張的民族主義。而在另外一方面，近代以來中國之所以遠遠落

在日本之後，而遭到自甲午戰爭到日本大東亞戰爭的種種摧殘，與近代以來日本人民以世界爲其活動以及歷史記憶的空間座標，中國人以中國或以東亞爲其活動及歷史記憶的空間座標也有關連，日本自甲午戰爭到日本大東亞戰爭對中國的種種摧殘，更將近代中國偏狹的民族主義節節推高。

最近李登輝總統在淡水小學的校慶說他在日據時代唸的小學歷史課本比現在台灣的小學歷史課本有世界觀，是近代中日兩國歷史記憶的空間座標有別的一個註腳。

這種感覺也見於台大一位外省籍的歷史學者十幾年前一篇史學回顧的文章。他注意到由台北帝大轉到台大，歷史系中的南洋史（東南亞史）研究跟著式微；如以台大校長傅斯年後來所創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集刊，與《台北帝大史學科研究年報》

互相比較，兩者都受歐陸科學史觀影響，重視史料蒐集及史事考訂，但前者只研究中國史，後者包括日本史、東洋史及西洋史。

日本自與西方接觸以來，其歷史研究即

具世界觀，而與中國史學有太強烈的中國中心觀有所不同。不久前，我擔任台北市今年秋天要用的國小鄉土教材的諮詢工作，發現小學老師們可以把龍山寺、祖師廟以及相關的佛教、道教思想寫得生動詳實，但卻沒有寫清真寺、聖家堂等宗教建築以及相關的回教、基督教思想。

中國大陸的史學在帝國主義侵略論的強調底下，有時會比台灣更注意世界史，但多半只著重列強侵略中國的一面，而沒有太注重及列強對華關係的更深遠背景。如中國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挫敗，中國學者多半強調中國本身洋務運動中的國防工業失敗，但翻開日本的教科書，會發現日本的洋務運動中的國防工業也失敗，日本用來在甲午戰爭中打中國的武器主要是買來的。而日本明治時期的稅入有六〇%以上來自田賦，其中約有一半用於國防。也因此，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用來打中國的武器主要是由農業部門提供的。

中國則因戰亂頻仍，而少科學農業的發展。因而，中國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輸給日本，主要是因爲科學農業的發展而不是國防工業的發展輸給日本。

如此一來，世界框架不只較能讓我們了解中國近代變遷的根源，也較能讓我們了解中國人以往爲什麼要以較偏狹的角度看中國近代變遷的根源。（龔祖遂先生學術基金會提供）（未完待續）